

非主流叙事话语下再评 《威尼斯商人》的人物形象与时代风貌

刘禧韵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图分类号】 I561.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01-0001-03

莎士比亚作为16-17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可谓是时代的万花筒，观照着现实的变迁性。而《威尼斯商人》作为其代表作品，通过出色的戏剧创造，折射出莎士比亚对于那个热切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时代的独特感知。作为小说的主角，安东尼奥等人无疑是主流叙事话语的代表，无论是在性别、种族还是社会地位上，相对而言，其他人物如鲍西娅、夏洛克则隶属于非主流叙事话语，是相对被边缘化的，通过探究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及莎士比亚所寄寓的某些隐微却深刻的感受，可以窥见属于那个时代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侧面。

一、微弱的女性声音——鲍西娅

作为女性，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在文学叙事传统中往往都处于从属地位，但《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却被罕见地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戏剧的高潮环节，当安东尼奥因为无法偿还夏洛克的借款而面临履行合约被割去一磅肉的生命危险时，所有人对于他的营救几乎都是无效的，无论是公爵还是他的朋友如巴萨尼奥、萨拉里诺、葛莱西安诺等人，他们除了试图凭借动一动嘴皮子晓之以理或谩骂以望博得夏洛克的回心转意之外，根本无计可施，但反观鲍西娅，却是毫无压力、游刃有余地玩转整个法庭，力挽狂澜。她先是在不经意的劝解调和和无用后从看似为夏洛克出发的角度诱使夏洛克坚持自己的观点处罚安东尼奥，再根据契约漏洞要求割肉不准流血、肉的重量不可轻一点或重一点而让夏洛克完全无话可说，最后通过威尼斯保护本邦人的法律让夏洛克一败涂地，鲍西娅以一己之力就解决了一群代表当时社会精英的贵族男性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从知道问题之初的策划和准备，到轻轻松松解决问题、再顺带和侍女一道戏弄了自己的丈夫，最后更是查明安东尼奥的商船满载而归为他带来意外之喜，在整个过程中她流露出的聪敏、智谋和冷静赋予她超越所有男性角色的主角光芒，就像罗兰佐所评价的那样，“两位好夫人，你们像是散布玛哪的天使，救济着饥饿的人们”，在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等人眼中，鲍西娅她们何止是天使，简直就是救世主般的存在，为他们带来好运和转机。而她在法庭上所展现的非凡口才更是罕见的女性声音的书写突破。莎士比亚对鲍西娅这一形象的塑造，给读者带

来一种错觉，仿佛在那个时代，女性已经拥有与男性一样的社会自由，能够与男性平等存在并轻易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这很明显是一个谬论，在这部戏剧的开头有这样一个细节，葛莱西安诺与罗兰佐、安东尼奥等人交谈时曾说过一句话，“只有干牛舌和没人要的老处女，才是应该沉默的”，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女性还是没有话语权的，依旧处于社会的边缘。通过文本细读也可以发现，鲍西娅发出自己的话语是有一定条件、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鲍西娅展现自己的才谋和实施一切营救依靠一个前提，她是放弃自己的女性身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性而出现的，她只有取得法律博士表哥的推荐信和在男性律师身份的伪装下，才能化身成神，扭转乾坤。她事先没有告诉巴萨尼奥她的计谋，很明显是因为她自己也很清楚，一旦提前告知他们，就不会有她出场、发声和表演的机会。是那件男装成全了她勇敢、智慧的女英雄和“救世主”的形象，她的成功也完全得益于那件男装，那身男性服装让她获得男性行动的部分自由、获取男权社会暂时的通行证，穿上女装的她依旧是没有话语权的。而另一方面，从鲍西娅一切行动的目的来看，鲍西娅的“发声”在本质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为自己女性身份的“发声”和代言，也不是为了普遍意义上正义的弘扬和伸张，而是为了帮助丈夫的朋友，为自己的丈夫排忧解难，从而履行自己在男性社会中的职责。才华不过让她更好地服务于男性社会，她争取来的胜利果实也是属于男性社会的，她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物化为服务男性的工具。

可以这样说，作为《威尼斯商人》中女性形象的代表，鲍西娅有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但在整体上还是归顺于男性话语，鲍西娅张扬的女性主体也是有限的、有一定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她反抗男权的声音和意识并不强烈，她清楚时代之下自己作为女性的处境，所进行的有限反抗也是符合男性社会对女性要求的。而这也能很好解释戏剧前面所展现的鲍西娅一些行为的矛盾性，她虽然打心底里不认同甚至厌恶已逝的父亲让她以匣子选夫婿的荒唐做法，“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但在实际上却也不敢违抗并无可奈何地遵从着；她虽然追求自由、拥有独立而澎湃的思想和过

人的智慧，却也甘于接受出嫁从夫的社会秩序，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贬低自己“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更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巴萨尼奥，把他当成自己的“主人”“统治者”和“君王”。

从叙事的角度进行总结，鲍西娅这一形象具有突出的矛盾性，她的“救世主”和“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一定程度的无为和无用形成了鲜明对比，她部分张扬的女性主体和实际对于男性话语的服从也具有两面性。莎士比亚这一笔法除了为整部戏剧增添人物丰满性和戏剧性，更折射出莎士比亚对于当时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和女性主体逐渐觉醒这些时代细微风貌的认知，是他富有洞察力的思想精髓的体现。这是基于社会风貌深刻理解而促使的、敢于大胆打破时代思想禁锢的、对女性形象书写的突破，可以说是对女性的歌颂、是女性主义的先声，但更是时代的回音。

二、生存空间逼仄的少数族裔——夏洛克

在《威尼斯商人》这一戏剧中，少数族裔的人物角色塑造也是值得注意的，从这里也体现了莎士比亚对于生活现时的社会种族和宗教关系的一些独特认识。

在这其中最浓墨重彩的莫过于夏洛克这一犹太商人的形象创设。对于这一形象一般的解读往往都认为他是唯利是图、冷酷无情、阴险狠毒、无耻狡诈的代名词，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在笔者看来，夏洛克确实有其性格缺陷，但他的所谓“歹毒”却也是站在个人亲缘和种族大义立场上孤注一掷的复仇，这复仇是有迹可循的，并非是没有前因仍无端肇事寻仇。他深刻的仇恨来自于日常生活点滴的积累以及女儿出走所带来的强烈被背叛感。

首先便是日常生活中没有休止的谩骂和侮辱，通过夏洛克的自白可以知道，他无时无刻不在遭受以安东尼奥等人为代表的基督徒的折辱，“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他憎恶我们神圣的民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即便是在有求于夏洛克的时候，安东尼奥、巴萨尼奥等人也并没有放低姿态，仍是抱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说夏洛克是“引证《圣经》来替自己辩护的魔鬼”，是“指着神圣的名字作证的恶人”，是“脸带笑容的奸徒”。如果说这样日日上演的种族羞辱奠定了夏洛克复仇的情感基础，那女儿杰西卡偷走家中财富与基督徒私奔的举动无疑是他复仇行动的催化剂。从剧中看，夏洛克的妻子是缺位的，与他相依为命的亲人唯有女儿杰西卡。可以说，与他有血缘关系和同等种族背景的女儿是他在日日遭受异族人排挤的生活中最大的精神安慰，他也是无条件信任自己女儿的，在赴邀去吃晚饭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杰西卡照管，叫她“留心照看门户”。可是

这样的信任换来的却是女儿卷走所有银钱宝石与人出走，拐走他女儿的更是将他日日踩在脚下的基督徒。他跟着公爵去搜巴萨尼奥的船却迟了一步，只被告知有人看见安东尼奥的朋友罗兰佐和杰西卡在一艘平底船里，恰此时安东尼奥也来向公爵证明杰西卡等人不在船上，可这此地无银、缺漏百出的说辞自然不能让精明的商人夏洛克信服，他“发疯似的”“在街上一路乱叫乱跳乱喊”“我的女儿跟一个基督徒逃走啦”，希望“公道”“法律”为自己讨回一切。而不久他又得知了安东尼奥商船触礁的消息，也促使他抓住难得的机会向安东尼奥为首要对象的基督徒进行报复，“我很高兴。我要摆布摆布他；我要叫他知道些厉害”，这达到顶峰的复仇情绪既来源于日常的辱骂，更是安东尼奥一派的罗兰佐拐走他女儿的强烈愤懑的投射和迁怒。之前签下的契约和安东尼奥的失约为夏洛克通过“法律”在这个“自由邦”找回公道提供了希望。

可是，法庭上的审判带给他的无疑是更大的失落和折辱。失约者割“一磅白肉”偿还这样的约定虽有一定的荒谬和残忍，但既是双方自愿平等签订，那违约者按约践诺本应是法律、公道的大义所在。但在法庭上，夏洛克看似合法的维权被鲍西娅轻巧地化解和转移，最后更是落得败诉而财产半数归受害者安东尼奥、半数充公的下场，在提出只收回成本不要利息并放弃诉讼的请求时，也被法官断然拒绝。这样的结果可谓是“借债人成了‘大哥’，而放债者成了‘老么’”，夏洛克的债主权利被剥得精光，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利息，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下场。如果说荒谬翻转的结局彰显了威尼斯这个所谓“自由邦”法律的“非人道”和虚伪性，那众人在法庭同仇敌忾地讨伐夏洛克更是完全消解了法庭的严肃性、正义性。在那场审判中，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倾向基督徒一边，共同针对异教徒夏洛克一个人，他们众口一词，用所谓基督徒的“仁慈”来谴责夏洛克的“残忍”，甚至可以公开辱骂夏洛克是“万恶不赦的狗”。这使得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之间的债权纠纷完全上升为种族和宗教层面的复仇和反复仇，而这昭然若揭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更是凸显出威尼斯的法庭就是基督徒的法庭，威尼斯的法律就是代表基督徒利益的法律，基督徒所宣称的“仁慈”精神更是荡然无存。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辱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这无疑是对种族歧视的血泪控诉，怀着这样

的不忿和站在法理正义上燃起的复仇火焰，终是被无视和扑灭，这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种族和宗教压倒公道的社会悲剧。在最后，夏洛克被迫无奈地接受现实、同意改宗，这是他以一夫之勇孤军奋战、与整个主流社会竭力抗争但难突重围、走向失败厄运后的黯然退场。通过夏洛克这一悲剧，莎士比亚浓缩了所有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悲剧，真实再现了他们在主流的基督意识形态下时刻遭受冷眼和欺压、艰难求存的生存状态和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作为最初的种族和宗教复仇者代表出现的夏洛克，改宗的结局让他“已经代表不了犹太教”，在这个意义上，夏洛克“不再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人”，而只是一个深受宗教歧视和压迫的犹太人，一个被迫磨灭自己身份认同和种族根脉的可怜人。

在那个时代，社会普遍排斥和歧视其他少数族裔是主流趋势，在这样强势的舆论环境下，莎士比亚不可能脱离时代的朝向，完全站在少数族裔的立场上批判社会的民族狭隘，但通过塑造夏洛克这一犹太少数族裔的形象让其“自行发声”控诉，再展示他在与种族、宗教主流群体的斗争中怀有合情合理的诉求仍完全落败的社会悲剧，让接受者能在代表社会主流的戏剧主角的大团圆结局之下，还自然而然地对本应仇视的夏洛克产生一种难以逝去的憋屈感、一种对其不合理命运安排的怜悯之情。而莎士比亚也在这样的戏剧效果中传达了自己对于社会隐微现状的独特思考，表达了对以夏洛克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下生存空间不断沦丧的深切同情，对社会狭隘却高涨的民族排外和宗教压迫的深刻警觉。

三、拮抗的时代人文主义

女性和少数族裔作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都是作为安东尼奥等人代表的性别和种族主流群体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作为整部戏剧塑造中心出现的安东尼奥等人，在与边缘群体进行交往和对比的戏剧情节展现中，却呈现出一定的负面性。

鲍西娅和尼莉莎等女性聪敏机智，在对安东尼奥的营救上处处展现智慧的光芒，但安东尼奥、巴萨尼奥等人却是在被动、无为中等待营救；她们全身心地对待自己的丈夫，他们却是在自己的名誉遭到质疑时轻易将当初誓言过珍藏的指环相送他人，他们甚至还以妻子的名义来起誓。从来发誓都应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如健康、财产甚至生命的东西，他们却可笑地以妻子的死亡表达决心，这明显体现他们将女性物化为自己的附属品、没有将女性置于平等地位的狭隘思想。而在与夏洛克的戏剧对比中，夏洛克除了收受高利贷，并无其他明显违反道义的行为，反而是安东尼奥等人动辄以不同的污言秽语羞辱夏洛克，毫无贵族应有的礼貌和修养；在同样面对他人大额借款之时，夏洛克谨慎考虑和评估安东尼奥的资产状况、商业信誉以

及还款能力之后方作出决定，而安东尼奥却轻率地基于忠义伦理借款给巴萨尼奥，将自己置于困境。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主流群体分别面对的两个以鲍西娅和夏洛克为代表的边缘群体——都作为行动的主宰者引导着整个行动的发展，他们自身却反而在对比中完全处于劣势。

无可否认，安东尼奥等人正是文艺复兴时代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正统代表，如安东尼奥是作为海上贸易商人的身份登场，别人对其评价也是“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在他身上存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代罗马的侠义精神”，但通过对比，他们反而却体现出软弱、无力和消极。莎士比亚通过对他们澎湃生命力的消解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文精神的高尚性，这是他基于对时代风貌真实和深入认识后的有意为之和戏剧投射。也许正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莎士比亚逐渐认识到人们一直高歌颂扬的人文主义理想所存在和固有的虚伪性，这样的认识呈现到他的文学创作上时，便在戏剧冲突和矛盾中表现出与人文主义主旋律相拮抗的不和谐音，他不再一味满怀热忱地讴歌人文主义的光辉和褒扬应时而生的新兴资产阶级，而是幽微地呈现他对某些社会问题的不认可和批判性的反思。

莎士比亚所代表的主流立场使得他最终还是为《威尼斯商人》设置了一个“邪不胜正”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女性没有绝对批判地对男性进行反抗，少数族裔最终也还是没能胜过基督群体。但通过人物身上表现的复杂性可以反映出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绝对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怀疑，他真实地展现了存在于他眼中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消褪的、性别立场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人文主义。这也是莎士比亚通过立体的人物塑造和复杂的戏剧情节设计所真实描绘的时代图景。

四、结语

《威尼斯商人》一剧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欧洲人文主义的另一种版本，这不仅折射出莎士比亚对当时社会真相的敏锐洞察和把握，更体现了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及超越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个体思考。他能够穿透表象，摒弃从众心理，始终秉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展现真实的时代风貌，并借助舞台向代表着社会主流意见的戏剧观众进行伦理教诲，意图唤起人们的注意。可以说，正是这种真正的人文关怀彰显出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道德之子”的精神气度，也赋予了莎士比亚戏剧永恒的时代魅力，吸引着读者在数千年之后的今天依旧为之倾倒。